

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叙事对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杨宗娟, 宋亚齐, 郭冬燕

大连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辽宁大连, 中国

【摘要】本文系统梳理了乡村建设运动的起源脉络, 深入探究其形成的历史语境与内在动因。继而聚焦梁漱溟、晏阳初两位核心代表人物, 对其乡村建设实践进行学理分析, 详细阐释二者差异化的理论体系、实践策略及其现实成效。梁漱溟构建以伦理情谊为纽带的组织架构, 依托乡农学校、自卫组织与合作社模式, 着力推进乡村自治与教育革新; 晏阳初则通过“四大教育”体系与定县实验, 实现农村教育现代化与社会治理改良的有机结合。研究基于历史经验的深度剖析与反思, 结合一号文件关于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建设及治理水平的策略导向, 提出新时代乡村振兴应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凸显农民主体地位, 秉持因地制宜原则, 强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同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与策略体系配套, 以此推动乡村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的协同发展。上述结论与建议旨在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实施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对实现乡村社会全面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 晏阳初; 乡村振兴

1. 引言

2025年2月23日, 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正式公布, 标志着新时代乡村振兴进入深水区。文件提出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和乡村治理水平, 深入推进农业增效、农村增活、农民增收,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基础。

学界近年来对乡村振兴的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刘娟、张森与卜斯源[1]在“乡村振兴研究述评与反思”中认为农村社会研究者应致力于丰富乡村振兴研究中的农民视角以增强对乡村现实的了解, 通过强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优化问题取向来发现并阐释乡村振兴中的真问题; 杜芳[2]利用 CiteSpace 梳理国内外乡村振兴研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 得出结论: 国内外乡村振兴的研究都经历了“起步期-蓬勃期-稳定期”三个阶段; 吴锋、康君颖与潘少立[3]借助 PSR 模型对秦岭南麓小流域乡村聚落空间集聚进行评价, 为生态视角下的乡村健康发展提供了可操作的评估方法; 允春喜与王飒[4]运用个案研究法, 分析精英俘获现象的生成逻辑, 提出通过强化村民政治效能感与引领等方式, 平衡乡村治理中的精英与民众关系; 郑梁思[5]认为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主张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法治教

育和强化司法保障。

本文紧密结合乡村建设学者对传统乡村治理智慧的挖掘与现代乡村振兴路径的探索, 梳理学界在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研究成果, 以此作为理论支撑与研究起点。研究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与对策研究法, 旨在构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学术框架。一方面, 以历史演进为主线, 回溯20世纪二三十年近代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语境, 深入探究其产生的必然性与时代局限性; 另一方面, 立足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 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提出针对性对策, 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研究系统梳理梁漱溟“乡治”与晏阳初“定县实验”的历史进程, 通过文本分析与史料研究, 精读《乡村建设理论》《农民运动的使命》等文献并结合档案史料, 解构其理念内涵与实施路径。重点解析梁漱溟以伦理本位重构乡村秩序、借乡农学校融合教育治理的实践, 以及晏阳初以“四大教育”破解定县发展困境的系统性探索。聚焦教育功能、农民主体、社会发展三方面。通过多维度挖掘, 提炼治理智慧与发展逻辑, 揭示对当代乡村振兴与治理现代化的启示意义。

2. 乡村建设运动代表人物及实践运动

2.1 梁漱溟的乡建运动实践

梁漱溟(1893—1988), 祖籍广西桂林,

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及爱国人士，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享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称号[6]。1929年，梁漱溟在河南村治学院担任教务长，开始深入研究乡村建设。1931年，他在山东省邹平县设立实验区，并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此专注于乡村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哲学基础上。他在《乡村建设理论》（见图1）一书中提到“西方近代化是从商业到工业，我们则是从农业到工业；西方依赖自由竞争，而我们强调合作图存”[7]。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中国不能简单地模仿西方或日本的发展工商业之路，同样，苏俄的“统治经济”模式，具有强大的政府主导特色，亦与中国的社会政治条件相悖。因此，梁漱溟提出了走乡村建设之路的观点。他强调，中国应该首先从振兴农业入手，通过提升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的活力，来带动工业的发展。他认为，这一路径不仅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更能有效推动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梁漱溟受到北宋“吕氏乡约”的启发，他高度称赞其中的四条法则，即“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并认为这些法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人生向上”的精神[8]。基于此，他提倡建立一个伦理情谊化且以人生向上为目标的组织，以此作为推动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不仅涉及经济层面的发展，更包括思想、文化和教育的全面改造。他强调，通过加强乡村自治提升农民的参与度和自我管理能力，是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关键。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主要经历了三个关键时期，每个时期都标志着其理论和实践的深化与发展。1927年，梁漱溟出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创办“乡村讲习所”，并亲自主持广东的乡治试验。然而由于缺乏当局的有力支持，这一实践未能成功落地。这也是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实践中经历的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指梁漱溟于1929年赴河南辉县开展村治运动，创办村治学院和《村治月刊》，并担任教务长和主编的这段时期。这是他在乡村建设实践中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他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理解乡村社会的重要阶段。第三个时期是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主持乡村建设运动。

他选取邹平作为实验区，主要是因为邹平地理位置优越、经济文化适中且民风淳朴，有利于开展各项实验活动。梁漱溟在当地推行了一系列乡村建设的措施，包括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组织等[7]。随后，梁漱溟于1933年选择菏泽作为实验县，并在1935年以菏泽为中心，将县政建设实验区扩展至济宁等地13个县。在邹平等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尤为丰富，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建立乡农学校，在乡建立“乡学”，在村建立“村学”，通过乡农学校等组织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使乡农学校发挥政府下级行政机构的作用，实现“政教合一”；二是建立“乡村自卫组织”，并在乡农学校设立“自卫训练班”。分批抽调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提升农民的自我防卫能力；三是建立农村合作社，将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如在邹平成立信用、棉花运销、林业等多种类型的合作社，但1937年全国抗战的爆发，使得乡村建设运动被迫终止[8]。在这三个时期中，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逐渐成熟和完善，不仅为当时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重要指导，也为后来的乡村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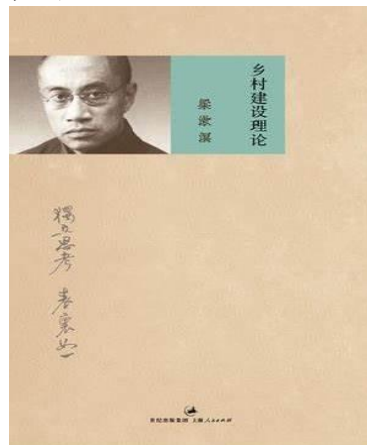


图1.《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著

2.2 晏阳初的乡建运动实践

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享有“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的称号，与陶行知先生并称“南陶北晏”。1920年晏阳初回国后，投身于上海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智育部，负责主持平民教育工作。1923年，他与蔡元培、陶行知、朱其慧等人在北京共同发起并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9]，并担任总干事一职。在晏阳初的领导下，平教会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平民教育活

动。

晏阳初所主持的“定县实验”是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乡村建设与社会改造实践。该实验涵盖了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两大核心内容，旨在通过教育的力量推动乡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定县实验”中，晏阳初以识字教育为基础，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方式，对农民进行全方位指导（见图2）。1930年，平教会经过深入调查，总结出中国农村存在的四大根本问题，即“愚、穷、弱、私”。针对这四个问题，平教会提出了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文艺教育旨在启发智慧，解决“愚”的问题；生计教育能够改善经济状况，解决“穷”的问题；卫生教育能够提升健康水平，解决“弱”的问题；公民教育则培养公民意识，解决“私”的问题。晏阳初坚信，教育的力量能够唤醒农民的潜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从而推动乡村社会的进步。他提出要在农村推进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旨在全面提升乡村社会的整体实力。



图2.定县平民教育课堂情景

平教会以定县作为乡村改良的实验中心区，从1930年开始在此地开展了一场深远的乡村建设实验，起初制订了10年规划，即前三年完成文艺教育，次三年完成生计教育，最后四年致力于完成公民教育。各个时期又分别实行卫生教育，以逐步改善乡村生活。然而，随着工作的推进，他们于1932年对这个规划进行了调整，将其缩短至六年，以期更高效地实现乡村改良的目标。在定县实验期间，平教会深入农民生活，细致观察，运用四大教育以求解决问题。此外，他们还努力消除农村青年文盲，积极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组织农村合作社，建立完善的医疗保健制度等，然而随着1937年全国抗战的爆发，定县实验被迫中断[8]。尽管如此，平教会在

实验期间所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的成果，对后来的乡村建设仍具有深远的影响。

3.乡村建设运动对当前乡村振兴的启示

梁漱溟曾坦陈，乡村建设运动“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7]。尽管乡村建设运动声势浩大，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这主要源于乡村建设派学者对当时中国社会基本性质和问题判断的失误。乡村建设派学者过于强调文化和人的因素，而忽视了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制约。他们试图通过发动和教育农民进行自我组织运动来解决问题，但这种方式并未触及到农村社会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土地问题这一农村社会的根本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使得乡村建设运动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不可否认，乡村建设运动确实在实践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乡村建设派在推动农村教育、培养农村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农村合作事业及其他公益事业、改革农村陋俗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乡村建设派的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当前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3.1 加强教育，重视知识分子在乡村振兴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乡村建设运动强调了知识分子在推动乡村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社会学家们通过倡导和实践改良措施，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战略指导。知识分子的“赋能改造”需与农民核心需求结合，避免单纯理论灌输，需通过职业教育、技术培训等方式提升农民内生动力[10]。这启示各地区在推进建设的进程中，应加大对乡村地区基础教育的高质量普及力度，不断提高乡村居民的基本文化素养和学习能力，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乡村建设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此外，结合乡村产业的特点，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开展多样化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如现代农业技术、电子商务等），使广大农民掌握实用技能技巧，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实现从传统农民向现代职业农民的转变[10]。教育方面，应注重鼓励和支持乡村成人继续学习，通过线上远程教育、线下社区培训班学习等方式，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促进乡村居民终身学习，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素质。

培育的知识分子拥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能够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乡村资源禀赋、

产业发展现状和社会的文化特点，并为乡村建设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策略，知识分子需“接地气”，融入农民生活，避免“悬浮化”的乡村建设[10]。因此在推进建设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鼓励他们深入乡村、了解乡村的真实需求，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乡村发展提供科学规划和有效指导。

3.2 科学决策，强调突出农民主体意识

乡村建设运动强调了调查研究 and 科学决策的重要性。通过山东鲁镇的案例分析指出，地方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行动中，农民常因“权利挤压”陷入被动参与困境，表现为决策过程中农民意见和利益诉求被边缘化[11]。这要求在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必须加强实地调研和分析，深入了解乡村实际，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科学决策需与农民主体意识强化相结合。一方面，科学决策为农民参与提供了方向支持。例如，宁波市通过“新农人服务团”引导农民参与产业规划，将电商培训与本土农产品结合，既提升农民技能，又增强其对规划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农民主体意识的强化为决策提供了群众基础。研究表明，农民主体性需通过“赋权、赋利、赋能”三重路径激发，避免政策设计与实际需求脱节[12]。因此，需通过“参与式预算”等机制下放村级项目决策权至村民代表大会，保障农民在产业规划、环境治理等领域的实质性参与。

农民是乡村发展的主要力量。激活农民主体性需优化治理结构，例如适当赋予基层自由裁量权、创新专项资金使用方式、强化农民责任意识等[11]。同时，可借鉴实践经验，通过与农民的角色互动（如引导农民成为产业投资者、公共事务参与者），逐步提升其自主性和能动性。这类实践既体现了科学决策与农民主体性的协同作用，也为构建“政府引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新格局提供了实证依据。

3.3 因地制宜，稳步有效推进农村社会全面发展

在乡村振兴建设中，防范形式主义需构建“制度+监督”的双重防线。一是建立动态监督体系，将考核指标从台账检查转向田间地头的实绩评估，运用无人机巡检、村民满意度调查等科技手段，形成“月监测、季通报、年度考核”机制。例如浙江省推行的“红黄绿”三色预警系统，对项目进度滞后村镇实时亮灯

督办。二是深化权责清单改革，明确县、乡、村三级权责边界，对违规摊派实行“一票否决”，确保责任精准到岗到人。在因地制宜发展层面，要构建“资源普查-需求对接-产业孵化”的闭环链条。通过驻村工作队开展“三访三问”（访农户、访精英、访企业，问需求、问痛点、问建议），绘制村级资源图谱，形成“一村一策”发展方案。如广西某瑶族村寨将非遗扎染技艺与现代设计结合，打造文旅IP，带动户均增收2.3万元。同时建立文化保护负面清单，对古建筑、传统工艺实施数字化建档，防止“建设性破坏”。产业发展注重“土特产”升级，通过冷链物流延伸产业链，运用直播电商拓宽市场半径，让乡土资源真正转化为振兴动能。

在科技赋能层面，可探索“数字乡村大脑”建设，整合农业物联网、卫星遥感等数据，构建村庄发展动态数据库。例如，山东寿光搭建智慧农业云平台，实时监测大棚环境参数，辅助农户精准种植，降低风险30%。同时，推行“政策计算器”小程序，农户输入土地面积、产业类型等信息后，系统自动匹配可申报的扶持政策，破解“政策不知晓、不会用”难题。对于生态脆弱地区，实施“建设红线智能预警”，通过GIS系统划定生态敏感区，项目规划自动触发环保合规性审查，从源头规避破坏性开发。此外，建立“乡创人才飞地”，在县域设立乡村创客服务中心，配套技术培训、品牌设计等六大服务模块，吸引200余个青年团队返乡孵化“稻田咖啡”“共享农庄”等新业态，形成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新格局。

4. 结论

通过对近代乡村建设运动代表人物梁漱溟和晏阳初的理论与实践考察，不难发现，乡村建设派在教育启蒙、农民组织、合作互助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为破解传统乡村问题提供了有益思路。梁漱溟通过伦理情谊化组织和乡农学校等方式，提升了农民的自治能力；晏阳初则以“四大教育”体系为核心，全面推进农村社会改良。然而，历史经验也暴露出当时运动未能触及土地制度改革、政治体制约束等深层矛盾，导致运动成效难以持续。

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应坚持以下几点：第一，教育和人才培养先导：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职业培训，全面提升农民文化素养和科技应用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

智力支持；第二，农民主体地位凸显：强化实地调研与民主协商，鼓励农民参与政策制定，确保决策科学合理、贴近实际；第三，因地制宜推进：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发展多元化产业体系，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治理结构；其他政策配套与多方协同：完善金融、土地、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鼓励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协同发力；可持续发展保障：坚持生态优先，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循环与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乡村全面振兴应立足历史经验，创新思路方法，既要借鉴乡村建设运动的成功做法，也要规避其局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动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振兴，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目标贡献智慧与力量。

参考文献

- [1]刘娟,张森,卜斯源.乡村振兴研究述评与反思[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4):5-31.
- [2]杜芳.国内外乡村振兴研究的知识图谱:热点演进、发展趋势及国际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231-240.
- [3]吴锋,康君颖,潘少立.秦岭南麓小流域乡村聚落空间集聚PSR评价研究——以乾

佑河流域柞水段为例[J].城市规划,2024,48(9):67-77.

- [4]允春喜,王飒.乡村振兴中精英俘获现象的生成逻辑及其破解——基于鄂东C村的个案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2):66-76.
- [5]郑梁思.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J].法学,2025,13(4):613-618.
- [6]刘琪.从梁漱溟乡建思想看美育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意义[J].美术,2021(6):26-28.
- [7]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中华书局:201810.497.
- [8]农村社会学编写组.农村社会学[M].钟涨宝,董磊明,陆益龙,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 [9]熊杰.晏阳初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J].中国档案,2021,(12):86-87.
- [10]黄家亮.赋利赋权赋能: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动力再造[J].江苏社会科学,2023(2):97-104.
- [11]侯同佳.乡村建设行动中的农民主体性参与:实践困境与优化策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122-133.
- [12]李超.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与培育路径[J].贵州社会科学,2023(12):137-144.